

美国文化外交的理念与机制

杨光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 四川成都, 610064)

摘要: 美国文化中心是美国近年在中国高等院校开展的文化外交工程, 其传播美国文化思想的目的反映美国文化扩张传统, 是在“宗教使命感”驱动下, 由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美国文化外交理念在中国的延伸, 并得到相对成熟的美国文化外交机制保障。比较美国文化外交理念和文化外交机制, 中国孔子学院在开展汉语语言教学同时, 应加强对中国文化思想的介绍, 并在机制上给予保障, 提升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有效性。

关键词: 美国文化中心; 美国文化; 文化外交; 孔子学院; 中国文化

中图分类号: G1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4)02-0154-05

当今世界, “和平、发展”成为主旋律, 各国在致力提升本国经济的同时, 更多地以和平方式处理国家间出现的各类问题, 而文化外交成为国与国相互交流和沟通的重要手段。以文化方式展现国家魅力进而展示先进思想带来政治、经济和科技方面的吸引力, “从而确立起能够塑造他人的价值取向的准则和制度”^[1], 已经成为文化外交的根本目的。为此, 世界上不少国家成立专门机构推广本国文化, 例如德国歌德学院、法国法语联盟、英国文化委员会以及中国孔子学院。相较以上文化机构, 起始于2010年的美国文化中心最年轻, 然而美国文化中心所折射的美国文化扩张传统, 体现的美国文化外交理念以及所反映的美国文化外交机制, 为研究美国当代文化外交思想提供了重要参考。客观看待美国文化中心, 对中国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具有借鉴意义。

一、美国文化中心所秉承的美国文化外交理念

在美国国务院支持下, 美国高校开始在中国高等院校建设美国文化中心, 加强对中国的文化输出, “美国文化中心的任务是从深度和广度上讲述美国文化, 其重要目标是超越美国流行文化的影响, 使大学生对美国文化、社会、政府、语言、法律、经济体系、以及美国价值观有更好理解, 因为大学生是中国未来的

领导阶层。”^[2]基于此, 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 美国文化中心举办了包括“美国音乐节”“美国文化日”“中美学生艺术节”以及“美国周”等各种美国文化主题活动, 美方高校也派出专家学者在中国高校举办各类学术讲座以及开设与美国研究相关课程, 领域涉及美国文学、历史、高等教育、体育、艺术、政治及宗教研究, 在与中方高校进行科研和学术合作的同时, 传递美国主流文化和价值观, 加深中国师生对美国的了解。截至2012年底, 建成的文化中心总数达到十九个, 从地域分布看, 已经覆盖国内主要城市。美国文化中心成为美国当前对华文化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文化中心的建立折射了美国文化扩张传统, 新教领袖约翰·温斯洛普1630年在其乘坐的阿拉贝纳(Arrabella)号帆船跨越大西洋前往美洲途中的豪言壮语成为这一传统的标志之一, 他写道: “我们必须考虑我们将作为山上之城。所有人的目光都注视着我们。”^[3]新教徒们要在美洲建立能够实现自己宗教理想的理想国度, 建立圣经中的山上之城, 成为世人的榜样, 由此, 继承英国新教思想的美国文化价值观表现出特殊的宗教使命感, 并在其后的三百余年中, 持续显现其影响力。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朱利叶斯·普拉特指出, 美国人始终“认为有一种天命在主宰和指导着美国扩张, 这种思想根植在我们的民族意识里面, 简直很少有不存在的时候”^[4]。无论是美国领土从大西洋沿岸向太平洋沿岸扩张过程中传播以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

收稿日期: 2013-09-03; 修回日期: 2014-02-11

基金项目: 教育部直属高校外籍专家特色项目“文化外交理论与中美高等教育交流模式体系研究”(TS2012SCBX048)

作者简介: 杨光(1969-),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西方思想史及文化批评理论

为主的宗教思想，还是美国为把更多国家吸引到自己怀抱而输出“优越的”政治制度，以及近年连续发动海湾战争，向伊拉克等中东国家输出自由民主普世价值观，美国都把主动传递美国文化思想作为重要手段，文化外交成为美国武器库中的重要兵器，成为实现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工具。

文化外交作为一种重要手段，折射了美国理想主义精神。事实上，美国是世界上使用武力最频繁的国家之一，例如通过与墨西哥的战争，美国获取德克萨斯；稍后的美西战争，使菲律宾成为美国殖民地；二十世纪强力介入两次世界大战；进入二十一世纪，美国出兵攻打阿富汗和伊拉克，等等。然而美国也充分意识到要征服别国，单靠武力是无法实现的，只有从文化上的征服才能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才能实现长治久安。早在俄国十月革命后，美国总统威尔逊就一度计划使用武力干涉，当发现武力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后，威尔逊说，“布尔什维克的侵略主要是思想上的侵略，你不能靠军队击败思想。”^[5]美国政府认为，“政治带有强制接受的烙印，经济渗透被谴责为自私和强制，只有文化合作才意味着思想交流和无拘无束。”^[6]以威尔逊总统为代表的理想主义者认为，一旦人类的教育程度提高，人类就可以用理性思维取代感性思维，解决问题的方式就不再是战争而是矛盾双方的协商，战争就可以从此消除，因此，以教育和文化改造人类的思维和感情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最好方式^[7]。在理想主义影响下，美国积极推进各种不同方式的文化交流，促进美国文化输出，其中不乏成功例子，例如二战后开始的富布赖特项目，就被广泛认为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文化外交项目之一。

虽然理想主义是美国文化外交的出发点，文化外交为现实利益服务的目的性也非常明确。美国著名非营利研究机构“美国艺术文化中心”对美国1938年以来七十余年文化外交历程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完成阶段性成果报告《美国政府的文化外交》，报告指出，美国文化外交最明显的特点之一是：每当“外来威胁”或“危机”来临时，美国联邦政府便会积极介入并支持文化外交。^[8]例如，为应对二战期间德国对拉丁美洲的文化渗透，罗斯福总统实施“好邻居政策”；冷战期间对前苏联和东欧地区开展文化攻势；“9.11”之后为赢得穆斯林世界对美国认同，布什政府在文化外交领域采取多项措施提升美国国际形象等，这些都是美国文化外交服务现实利益的例证。美国文化中心的建设同样是美国感到中国孔子学院所带来的“中国文化威胁”的必然结果，在2011年一份由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提交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题为“美国另类赤

字：互联网时代中国与美国公共外交”的报告里，美方认为在美国文化中心成立之前，美国在中国只有包括由北京大使馆运作的“美国中心”和位于四个驻华领事馆内的文献信息中心总共五个官方文化机构，相比在美国的七十余个孔子学院，美国在文化外交领域处于“赤字”状态，因此建立美国文化中心势在必行。从这种意义上看，在中国高校建立的美国文化中心成为美国在文化领域与中方开展较量的重要手段。理想主义思想和现实利益相结合，以文化交流方式实现美国国家利益，已经成为美国文化外交的核心理念。美国的决策者们深受美国“上帝选民”这一宗教使命感影响，认为美国的价值观是世界楷模，从而使传播美国“文明”、“教化弱小民族”演变成美国的国家使命，基辛格博士也认为，“美国的价值观使美国人自认为有义务向全世界推广这些价值观”^[9]，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认为，正是文化、政治价值观以及外交政策构成了一个国家的软实力^[10]。美国正是充分利用体现人类发展先进成果的价值观、政治制度，以及由此带来的科技创新和一切可以对别国产生吸引力的资源，形成自己的软实力，进而产生控制力，最终实现本国的国家利益。

二、美国文化外交的机制

美国“宗教使命感”“国家使命感”深刻地影响着美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活，形成了美国人普遍存在的公民宗教意识与参与文化外交的自觉性。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对外文化交流主要以个人、教会或民间社团的形式把美国价值观传播到世界其他地区。随着美国国力的逐步强盛，宗教的使命感逐渐演变为炫耀宗教化的美国政治文化的优越感，^[11]美国官方机构从二十世纪上半叶开始参与并与民间组织共同实施对外文化交流工作，美国国会、政府、高等院校、各类基金会、民间社会团体以及美国民众共同构建了美国相对成熟的文化外交机制。

首先，美国国会以立法的形式，提出法案、促进并确保文化外交项目持续有效实施。在美国涉及文化外交的法案中，1946年由富布赖特参议员提出的富布赖特法案无疑最负盛名，此外，194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史密斯-蒙特法案(Smith-Mundt Act)，该法案除了“增进美国公民和外国公民的相互了解”，也从经费上保证了富布赖特项目的持续开展^[12]。这一法案也始于1940年的国际访问者项目(该项目从2004年更名为国际访问领导者项目，International Visitor

Leadership Program, 简称 IVLP)得以继续开展, 该项目每年邀请三千至四千名国外有潜力成为领袖的人士访问美国, 在相关领域与美国专家学者进行广泛深入交流, 使他们从根本上了解美国社会制度以及美国价值观。根据美国国务院国际访问者项目办公室统计, 截至 2008 年, 已经有 284 名 IVLP 项目成员成为所在国家或地区的国家元首、政府总理或地区领导人, 其中包括前英国首相布莱尔、前法国总统萨科奇、澳大利亚现任总理吉拉德以及台湾地区现任领导人马英九等, 另有超过 1500 名 IVLP 项目成员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内阁或议会成员, 美国这一文化交流项目造就了一大批各国政府的“知美派”甚或“亲美派”。虽然 IVLP 项目被富布赖特项目的耀眼光环所遮蔽, 它仍然成为由美国国会推动的最为成功的国际文化交流项目。美国国会的法案, 都有相应的立法背景, 例如通过史密斯-蒙特法案时正值冷战初期, 虽然法案本身充满理想主义精神, 然而与前苏联在文化领域开展竞争的历史背景使其蒙上了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在中国高校刚成立不久的美国文化中心的宗旨也是“增进美中两国深入了解”, 与史密斯-蒙特法案的初衷如出一辙, 其理想主义旗帜下的现实用意, 值得建有美国文化中心的中方高校仔细分析和深思。

除了国会, 美国政府在文化外交机制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执行者角色, 其执行力也随着文化外交经验的积累而不断提高。在文化外交的执行理念上, 美国在 1938 年文化关系司成立之初即制定了三条准则: ① (文化活动)要避免宣传色彩的痕迹; ② 远离情报收集工作; ③ 对一些本已脆弱濒危的外国文化的影响要最小化。^{[13](xi-xii)}美国政府机构对直接参与文化外交也很谨慎, 以避免被公众误读为政府操控文化活动, 例如上文提到的 IVLP 项目虽然由美国国会批准、国务院组织实施, 但国务院通常只负责确定受邀人选, 而项目的运作被委托给诸如梅里迪恩中心(Meridian International Center)等非政府组织, 从而消除政府干预文化交流的猜疑, 使文化交流效果得以最大化。当前正在中国高校运作的美国文化中心也是如此, 美国文化中心由美国国务院出资, 而具体运作由美国高等院校负责, 美国政府直接参与的程度被最小化。

最后, 美国文化外交机制得以高效运作, 与包括高等院校、各类基金会以及民间文化、艺术、体育等社会团体的积极参与密切相关。由宗教使命感演化而来的国家使命感, 使美国人民把美国价值观和政治制度神圣化, 认为自己有责任有义务把优秀的普世价值观推广到全球, 这种认识促使美国社会各界积极参与

文化外交, 这也是美国文化中心在中国高校得以迅速壮大的根本动因之一。美国高等学校积极向美国驻华大使馆申请建立新的美国文化中心, 并利用所在高校的优势资源, 积极与中方高校开展学术和科研交流, 如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位于美国西南部, 对包括西南印第安文化和西南区域研究有独到之处, 与中方合作高校在这些领域开展的合作非常有特色; 如明尼苏达大学以体育学科见长, 与中方高校开展的体育文化交流丰富多彩。如此, 以美国高校为文化交流活动筹划核心, 美国文化中心开展的各项活动从种类的广度和内容的深度都得到充分保证, 文化传播效果得以最大化。此外, 以福特基金会为代表的非政府组织也积极参与美国文化中心运作, 福特基金会赞助了 2012 年在北京召开的首届美国文化中心主任联席会议, 会议的目的是交流美国文化中心的各种文化实践, 探讨实现资源共享并筹集资金开展更多活动的可能性, 以便形成一张不断壮大的文化传播网络。此外, 福特基金会拨款三十八万美元, 在未来三年继续赞助该会议, 此举为美国文化中心在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很多美国文艺团体也开始参与美国文化中心的各项交流活动, 带来具有美国特色的各类文艺表演, 以直观的方式感染中国观众, 使中国高校师生面对面地感受美国艺术风格和其感染力, 以达到使他们认同美国文化的目的。

虽然当前美国文化外交机制已经基本成形, 但在过去的几十年, 负责文化外交的机构也经历了频繁调整, 1938 年成立文化关系司, 二战初期成立战时信息处, 1953 年文化外交的相关职责归于美国新闻署(USIA), 1999 年由于冷战结束美国新闻署被克林顿总统撤销, 文化外交的职能重新回归国务院文化与教育局, 美国文化外交经历了从巅峰到低谷, “911 事件”后, 文化外交重新受到重视。机构虽然在不断变化, 美国理想主义者始终把“展示美国文化的创造性和活力”作为美国文化外交的主要内容,^{[13](61)}美国文化外交界也公认, 只有通过与一国人民直接、成功的交流, 才能使他们对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有彻底的理解。但是, 文化外交的特点决定了美国更多宣扬其普世价值观和文化积极的一面, 而对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 诸如种族歧视、吸毒贩毒、暴力犯罪、物欲横流、贫富悬殊等, 却视而不见。美国历史学家小阿瑟·斯莱辛格在其《美国的解体》一书中指出, 如果美国不正视这些问题, 美国的凝聚力会大大削弱, 并可能导致美国最终走向解体。因此, 实现文化外交诚实性, 美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美国文化外交的启示

相比较具有积极对外扩张传统的美国文化，中国文化在对外文化交流主动性方面有所欠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以及鲁迅先生提倡的“拿来主义”，折射出中国文化更擅长于吸纳外来文化的特质，而除了张骞出使西域以及郑和下西洋等少数积极对外文化交流案例，中国悠久的文明思想、建筑艺术、文学作品以及民间艺术等，在二十世纪以前，更多是国外来华人士通过书籍以及贸易等方式介绍到国外，并对西方文化产生较大影响，例如马可·波罗和利玛窦，两人的著述对促进西方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做出了巨大贡献。国学大师季羨林先生也认为，历史上中国文化“送出去”更多可能是无意识的，由于语言文字的差异，介绍中国文化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14]。

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和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中国开始认识到主动介绍中国文化的重要性，而确定孔子学院推广汉语语言作为传播中国文化的突破口，使全世界更好理解博大精深的中国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抉择。自2004年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建立，中国文化在积极“走出去”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并且在近年发展迅速，据国家汉办官网，截至2013年4月，仅在美国的孔子学院就已经达到92所。然而，相较美国漫长的文化扩张历史以及利用文化外交实现国家利益的丰富经验，中国在应用文化外交的理念和机制上，尚待不断丰富和完善，落实到孔子学院，还有不少地方需要优化。

首先，相比较美国文化中心把传播美国思想放在首要地位，孔子学院对中国文化思想的介绍应该加强。孔子学院在国外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包括教授中文、介绍中国书法、举办文艺演出、推广中华武术，等等，虽然形式多样，但诸如文化讲座等有思想深度的活动数量偏少。此外，推介中国古代文化的活动多，展示现代文明的活动少。很多孔子学院里鲜有孔子著作，也少有专门介绍孔子思想的课程，因此，孔子学院暂时只有孔子的名字和塑像，而没有反映孔子思想和中国文化精髓的作品引入和推介^[15]，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遗憾。中国思想文化源远流长，从仁、义、礼、智、信，到天人合一以及和谐社会，无不是中国文化精髓，因此，孔子学院在教授中文的同时，以适当的方式传播中国深邃的思想，会使外国朋友对中国的了解更加深入，中国文化也才会更有吸引力。

其次，在孔子学院的运行机制上，政府部门需要

减少介入，民间机构需要更多参与。美国文化外交专家宁科维奇认为，美国人对官方文化历来比较反感，对文化的政治控制有根深蒂固的敌视，他们从来就没有从整体上接受政府与文化与信息有紧密联系^[16]。如果文化机构与政府关系密切，其在西方的接受度就会相应下降。不能否认的是，孔子学院与国家汉办的联系还是过于紧密，以致相当多的美国人担心孔子学院成为促进中国政治影响的工具^[17]，事实上，美国人的这些担心直接导致了哈岗学区事件和美国政府拒发孔子学院中方教师签证事件，虽然事件都得到妥善处理，但孔子学院传播中国文化的效果因此受到影响。由此看来，孔子学院还需要建立更合理的机制，官方色彩少一些，民间色彩浓一些，中国文化在世界上接受度也会相应大一些。

最后，虽然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起源不同，然而人类追求和平、发展的共性决定了中美文化交流应该求同存异。孔子学院也可以通过介绍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共性，从而获得更多的接受和认可。文化交流与融合是二十一世纪经济、政治和科技全球化的必然结果，美中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也是东西方不同文化的代表，双方文化的差异性和互补性是文化交流的基础，美国需要尊重中国选择的发展道路和民族文化传统，中国也需要借鉴美国反映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在此基础上，双方加强合作与交流，才能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从而实现双方共同利益。孔子学院与美国文化中心应该成为双方在文化外交领域合作的典范，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 [1] Robert Keohane,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 [J]. *Foreign Affairs*, Vol. 1998(5): 81-94.
- [2] 首届美国文化中心主任会议公报[DB/OL] <http://www.cvent.com/events/2012-american-cultural-centers-directors-meeting-accdm-/custom-21-399fc628926948269c206007bc994fef.aspx>, 2012-07-20.
- [3] John, Winthrop. A Model of Christian Charity[C]/J. A. Leo Lemay. *An Early American Reader*.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1993: 23.
- [4] 亚历山大·坎贝尔. 扩张与帝国主义[M]. 纽约: 哈珀和罗出版社, 1970: 23.
- [5] 王晓德. 美国文化与外交[M]. 天津: 天津教育出版社, 2008: 354.
- [6] Frank Ninkovich. *The Diplomacy of Ideas: US Foreign Policy and Cultural Relations*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27.

- [7] 倪世雄. 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34.
- [8] 金元浦. 美国政府的文化外交及其特点[J]. 国外理论动态, 2005(4): 33-36.
- [9] 亨利·基辛格. 大外交[M]. 海口: 海南出版社, 1997: 2.
- [10] 约瑟夫·奈. 软实力: 权力, 从硬实力到软实力[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3: 15.
- [11] 胡文涛. 美国文化外交及其在中国的应用[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8: 58.
- [12] History—International Visitor Leadership Program [DB/OL] <http://web.archive.org/web/20080412093829/http://exchanges.state.gov/education/ivp/history.htm>, [EB/OL], 2013(06): 15.
- [13] Richard Arndt. The First Resort of Kings: American Cultural Diplomac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M]. Dulles: Potomac Books, Inc., 2005.
- [14] 季羨林. 东学西渐丛书总序[C]//王宁. 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9: 3.
- [15] 董璐. 孔子学院与歌德学院: 不同理念下的跨文化传播[J]. 国际关系学院学报, 2011(4): 101-107.
- [16] 胡文涛. 美国早期文化外交机制的构建: 过程、动因及启示[J]. 国际论坛, 2005(4): 65-69.
- [17] 李开盛. 孔子学院在美国的舆论环境评估[J]. 世界政治, 2011(7): 76-93.

Idea, institution and revelation of American cultural diplomacy

YANG Gua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China)

Abstract: Center for American Culture (CAC) is a project conducted by the U.S. government to spread American culture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It is a reflection of American tradition of cultural expansion. It is also an embodiment of the idealistic and realistic thought of the American cultural diplomacy.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the idea and institution embodied in CAC, this paper attempts to find out some points that Confucius Institutes could learn from the Center for American Culture.

Key Words: Center for American culture; American culture; cultural diplomacy; Confucius institute; Chinese culture

[编辑: 颜关明]